

再次,要以探索“地区关系和谐化”为共同路径。中国和谐世界理念得到普遍认同,但如何构建和谐周边面临很大挑战。其一,如果说和平发展是实现和谐世界的路径的话,那么这条路应该怎么走?如果单方面地和平发展行不通怎么办?能否运用武力手段维护和平发展?其二,西方冷战式的“冲突思维”在周边仍很盛行,这种思维认为只有一方对另一方的胜利才是解决冲突的方式。而中国式的“和谐思维”强调争端各方可以长久搁置争议,留待时机成熟时予以“化解”。在此之前,双方可以长期共存,相安无事。但这种思维往往被外界理解为“秋后算账”。其三,各方处理争议的方式也不同。比如在南海问题上,美国利用矛盾拉偏架;一些东盟国家倚美制华,要求多边化;而中国希望以邻里方式双边解决。目前,还很难找到兼容或者超越三种方式的更好办法,造成南海争端前景不明,给和平发展道路蒙上阴影。因此,推进中美邻良性互动关系,既要避免中美对立、邻国选边站的极端,又要避免中美共治、邻国被压制的另一个极端。合理的办法只能通过地区关系和谐化路径,实现“中美邻良性互动”。一是自我克制。由于国家安全的相互依赖性,一国安全外交政策必须自我克制,同时还必须接受其行动自由在一定程度上要被其他国家所约束。

安全合作、国际组织、国际条约都是国家接受约束和自我约束的手段。大国、小国都要自我克制,大国既不能走地区霸权道路欺负小国,小国也不能因大国的自我克制而挑衅大国。对中国而言,就是“体仁行义”,“修己安人”;对美国而言,就是放弃绝对安全、弱化霸权行为;对于小国而言,就是慎用矛盾、少走边缘。二是矛盾管理。中国的和谐思想并不回避矛盾,是在整体共存中接受、转化、化解矛盾。这就为丰富和完善和平发展道路找到了理论依据,即矛盾管理、危机管理、冲突管理是和平发展道路的应有之义:和平发展不是单方面的,而是双向的,我遵守你也得遵守;和平发展不是不使用武力,当冲突管理失败后,战争和武力手段是最后的政策选项;和平发展强调处于矛盾或纠纷中的各方必须找到共同认可的方式、机制和规范。因此,建立信任措施,推进预防性外交、实施战略再保障、完善合理的竞争规则,以及设置必要的冲突及危机管理机制,势在必行。三是共同责任。没有规矩,无以成方圆。建设和平、繁荣和开放的周边是各方共同事业和共同责任。中国可以与各方一起,就共同责任和共同规范进行讨论,具体包括内容、原则、目标、方向、任务、机制、执行、监督、评估、完善等。○

中国周边外交:在继承中发展创新

刘江永 (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、教授)

我认为,中国对周边地区的外交战略目标是为习主席提出的“中国梦”,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总体国家战略目标服务的。它既有明显的继承性,也会伴随形势发展变化而与时俱进。就其继承性而言,自从1978年决定实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政策以来,中国外交战略的基本目标便是,营造和保持和平的国际环境和良好的周边环境。这一目标至今未变,以后也不会改变。

但与此同时,中国30多年来的发展使综合国力明显跃升,中国在亚太地区乃至全球的经济、政治、

战略地位和影响力明显提升,中国企业海外投资、市场扩大,使中国与世界各国特别是同周边邻国的相互依存关系不断加深。生态环境、气候变化等全球治理问题前所未有地摆在人们面前。中国的国家发展利益与安全利益的内涵和外延也随之发生变化。中国周边及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期待和担忧同时增大。包括中国邻国在内的世界各国,在国际重大问题上都想听中国怎么说,更想看中国怎么做。中国周边外交战略必须根据新形势采取新对策。

21世纪第二个十年以来,中国周边形势出现

“阴阳两重天”的新态势。即,俄罗斯、中亚地区等中国西北部陆地周边环境基本稳定,堪称是“阳”;在中国东海和南海局部地区,中国与日本、菲律宾围绕岛屿及海洋权益矛盾则有所发展,堪称是“阴”,并时而“阴转多云”,未来甚至可能呈现“山雨欲来风满楼”之势。南亚和东南亚则是总体为“阳”,局部时而为“阴”。美国在中国周边发挥什么作用,关键要看其是否在加剧中国与邻国的矛盾,是导致中国周边形势“阴转多云”还是“多云有雨”。

中日钓鱼岛领土争议之所以会牵一发而动全身,是因为它是一个会对中日关系全局产生影响的关键局部问题。从围绕钓鱼岛的国际战略格局和态势看,目前对中国相对有利。从历史上看,1871-1895年,中国内忧外患深重而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崛起。当时日本看准中国面临俄罗斯入侵新疆、法国入侵越南,便开始染指朝鲜和琉球国,最终目的是灭亡中国。针对1840年鸦片战争后国力衰落、腐败无能的清政府,日本于1874年首次入侵台湾。之后又通过发动1894年甲午战争秘密窃占钓鱼岛,殖民统治台湾50年。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后本应将钓鱼岛与台湾一起归还中国,美国却利用中国陷入内战之机占据了这些岛屿。1969年,日本借中国国内“文化大革命”及中苏边界发生冲突之机,首次在钓鱼岛建立冲绳县石垣市的标桩。1971年,佐藤荣作内阁又利用美国对中国的冷战政策促使美国在归还冲绳时,把钓鱼岛施政权交给日本。如今,日本当政者又认定未来中美矛盾不可避免,美国重返亚洲有利于日本利用中美矛盾,另外还可利用中国同菲律宾及越南等国的矛盾,在钓鱼岛问题上陷中国于不利。2012年野田佳彦内阁“购岛”导致中日关系恶化。安倍晋三再度执政后的外访活动和下一步日本防卫计划大纲的调整,矛头几乎均指向中国。然而,其结果必将适得其反。二战后,第一个企图全面遏制中国的是美帝国主义,第二个企图战略包围中国的是前苏联,结果都失败了。日本当政者如果想做第三个挑战者,甚至企图给历史翻案,改变战后国际秩序,只会失败得更惨。而这种来自日本的挑战和压力,目前已经转化为中国进一步强化同除日本、菲律宾以外所有周边国家关系的动力,

客观上有利于中国周边外交的大发展。当然,中国同日本、菲律宾人民同样要保持友好。从长远看,中日关系、中菲关系应当而且也能够得到改善。

中国当前和未来一个时期的周边外交战略,自然是要围绕总体国家战略目标,针对主要矛盾,趋利避害,巩固和发展陆地周边的有利局面,同时面对来自海上的挑战,促使局部“阴”转“晴”,扶正压邪。中国对周边邻国外交将长期遵循和平共处五项原则,实行“与邻为善、以邻为伴、携邻共富、睦邻同安”政策,不断增强应对各种挑衅和威胁的能力。

首先,努力营造和维护开放、自由的国际经贸环境,争取可持续发展。中国对周边地区的经贸战略目标是,充分利用地缘经济优势和良好发展态势,实现与周边各国的互联互通、互利互惠,通过自由贸易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。最近,习近平主席、李克强总理先后出访东盟各国,高举和平合作大旗,积极推进区域双边、多边务实合作,取得了重要进展。

其次,努力营造和维护和平稳定的周边安全环境,争取可持续安全。可持续安全涉及国内、国际两个大局,维权、维稳双重任务。要做到这一点,中国除了把国内的事情办好以外,在国际上要提倡和推动和平的多边主义,反对暴力的多边主义或单边黠武。事实反复证明:和平的多边主义占上风的地区或时期,国际局势就缓和、稳定;暴力的多边主义占上风的地区或时期,国际局势就紧张、动荡。“和平的多边主义”是指通过和平方式、对话谈判解决国际争端,通过互利合作谋求和平发展,例如,联合国、世贸组织、20国集团、亚太经合组织、东亚峰会、朝核“六方会谈”等。“暴力的多边主义”是指依靠军事集团、军势优势、军事打击来谋求单方获益的强权政治。21世纪,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最大威胁将来自两个方面:一是国际恐怖主义;二是暴力的多边主义,以及这两者之间相互展开的热战。冷战后世界发生的所有局部战争和对主权国家的外部军事入侵,都是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军事集团或多国部队所为,其结果不仅没有消灭恐怖主义,反而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,酿成21世纪的局部战乱与浩劫,并导致参与国陷入财政危机、社会危机,制造了大量战争碳排放,成为全球气候变化的主要成因之一。

因此,暴力的多边主义应受到世界各国人民的反对。

2013 年以来,暴力的多边主义首次受到有力的阻止,即在叙利亚问题上,北约不参战,美国没动武。在这一过程中,俄罗斯政府、英国议会、德国政府都发挥了积极作用。中国也坚定地站在世界和平力量一边,同时希望叙利亚化武得到销毁,内战早日结束。然而,值得警惕的是在亚洲的另一种倾向——针对朝鲜半岛的多边联合军演仍在继续;日本政府在竭力谋求突破战后禁区,行使所谓“集体自卫权”,实际上就是以所谓“自卫”为名在海外使用军事力量,与美国等国联合作战。倘若日本继续沿着这条路走下去,很可能成为未来东亚地区暴力多边主义的一个策源地。这需要引起日本人民和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与警惕。

第三,在双边关系方面,努力提高同周边各国关系的质量和水平,实现与主要国家关系的“全面战略伙伴化”。这是在中国发展壮大过程中,有关各国与中国的共同利益和政策取向所决定的。俄罗斯、中亚国家、韩国、印尼、马来西亚等国便是如此。无论具体提法如何,这种全面战略伙伴关系都有如下共同特点:一是相互尊重对方的核心利益,双边关系长期稳定;二是彼此合作范围包括政治、经济、安全、人文等领域,相当广泛;三是在国际事务中保持高度协调,相互支持。这种高质量、高水平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并非军事同盟,与暴力的多边主义毫无关系,有可能成为未来国际关系的一种新模式,也可以为中美建立新型大国关系提供参照。

第四,关于指导中国周边外交的战略思想,不能把邓小平提出的“韬光养晦、有所作为”这两者对立起来,作非此即彼的理解。其实,这两者就像中国《易经》所说“太极”中的“阴”与“阳”密不可分,既对立又统一,而且阴中有阳,阳中有阴,可以相互转化。从这个意义上讲,中国外交战略思想的真谛是包括“阴”与“阳”的“太极”思想,这也堪称是中国的外交哲学——辩证唯物主义与中国传统战略文化的结合。高超的外交艺术就如高手打太极拳,刚柔相济,进退自如,善于化危机为转机,变不利为有利,变被动为主动,四两拨千斤。中国在推进周边外交战略时将长期坚持“既韬光养晦又有所作为”的战略思维。“韬光养晦”不等于丧失原则,无所作为,一味忍让,任人欺负。“有所作为”不等于脱离实际,为所欲为,背离科学精神,而要谦虚谨慎,善于合作。做人如此,治国亦然。切记,过犹不及,若处理不当,阴阳、盛衰是会相互转化的。中国虽已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,但经济质量和社会发展在许多方面仍然处于发展中国家水平,切记不可“树未大先招风”。特别是伴随中国自身的发展壮大,中国人在国际上更要有闻过则喜、见贤思齐的胸怀,更要尊重中小国家,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和国际规则的制定提出更多有价值的议题,但不挑头、不扛旗去针对某一大国,而是内方外圆,与所有善待我之国家和民族真诚合作,视若手足。这或许即是中国在发展壮大、有所作为过程中的一种韬光养晦——君子之国的王道风范。○

关于新时期中国大周边战略的思考

袁 鹏 (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、研究员)

谈论周边战略,首先必须明确中国周边的边界在哪里。应该说,不同时代,中国对周边的理解是不一样的。古代中国,“普天之下莫非王土”,可谓世界就是周边,周边就是世界,是以一种盲目的、居高临下的“天下观”看待自己和世界的关系;近代中

国,闭关锁国政策与朝贡体系架构一同被西方坚船利炮击毁,只得忙于自保自救,无暇亦无力经营周边;新中国成立以后,无论“一边倒”还是“一条线”战略,都是以一种极度危机感的防御态势注视近邻,周边更多被赋予军事安全或战略意义,是名副其实